

·建馆110周年纪念之典籍旧事·

编者按:原藏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本《四库全书》,民国初年移贮京师图书馆,现已与敦煌遗书、赵城金藏、《永乐大典》共同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。然而与文津阁本《四库全书》同时庋藏的雍正间活字印本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却不在国图馆藏中。为之,国图前辈展开了半个多世纪的寻访。

文津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追踪记

李致忠

一、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由热抵京与入藏

清宣统元年(1909)旧历三月三十日,学部“分年筹备事宜”中正式制定在“京师开办图书馆”的规划。同年,七月二十五日即公历1909年9月9日,军机大臣兼领学部尚书张之洞病亟,学部虑公有不讳,功败垂成,遂于二十五日将建馆专疏呈奏清廷:请派四品卿衔翰林院编修缪荃孙充任京师图书馆监督,国子监丞徐坊为副监督,学部郎中杨熊祥为提调;且请敕礼部铸“学部图书之印”,尊藏钤用。同时在副片中请敕将内阁大库藏书、翰林院旧藏《永乐大典》、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及各殿藏书、国子监南学旧藏等拨交京师图书馆。疏入当天,即奉旨依议施行,标志京师图书馆——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——正式成立。

京师图书馆获准成立后,学部立即展开包括选址建馆等一系列筹备工作。然至宣统三年(1911)十月,武昌首义,辛亥革命爆发,清朝鼎革,京师图书馆筹建工作亦随之中辍。1912年,京师图书馆划归教育部领属。1913年6月27日,教育部旧案重提,致函热河都统姜桂题,谓“查本部接管前学部案卷内,有奏请拨给文津阁避暑山庄藏书交京师图书馆一件,于前清宣统元年七月具奏,当奉依议在案。现在京师图书馆已经开办,所有前项书籍,拟即派人往取,谨先行函达”。8月12日,热河都统姜桂题电咨教育部,谓“俟派员到热

后,自当将文津阁藏书一律点交运京,以符成案。其餘殿阁所藏书籍,则留存热河图书馆,以为纪念”。其实,所谓热河图书馆,当时还只是一纸空文,尚无端绪,姜氏之所以要这么说,完全是一种托词,意在寻找借口,不想交出各殿旧有藏书。并且不待教育部来人接书,“竟于一九一三年年底把《四库全书》三万六千餘册派人押运送京”。目的何在,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。教育部得到其时国务院的通知后,“始获悉《四库全书》已由热河起运,将于一九一四年一月六日运抵北京”^①,故指派鲁迅于1月6日前去接书。这一天的《鲁迅日记》写到:“晨,教育部役人来云,热河文津阁书已至京,促赴部,遂赴部。议暂储大学校,遂往大学校。待久不至,询以德律风,则云已为内务部员运入文华殿,遂回部。”^②则并未接到该宗藏书。

一年又七个月后,即1915年8月6日,教育部又致函内务部,指出:“文津阁所藏《四库全书》一部,照前清宣统元年七月奏案,应提交京师图书馆……刻下,京师图书馆业由本部指定房屋,并呈明大总统派定专员充任馆长,力策进行。是项《四库全书》为中国古今图籍之总汇,京师图书馆为首都册府,自应收藏,以宏沾溉。拟请即日移交本部,转发藏庋,藉符方案而惠艺林,实纫公谊。”在教育部的据理力争下,是年8月25日,内务部才复函教育部,同意将《四库全书》归还教育部,并请教育部派员前来商定移交手续和日期。接此,教育部于8月30日通知内务部:“兹派佥事周树人、主事戴克让,于九月一日午后二时前赴贵部,商订一切手续,即希查照为荷。”^③乙卯年(1915)9月1日《鲁迅日记》所载“午后同戴芦舲往内务部协议移交《四库全书》办法”^④,与教育部所通知内务部者完全相符,证明将《四库全书》从内务部要回教育部的具体交涉事宜,是鲁迅实际操办的,并且洽办成功。当时议定,从9月6日起,由戴克让率京师图书馆三人会同古物陈列所一人共同清点交接。经过一个月的有效工作,至10月7日,京师图书馆馆长夏曾佑具文呈报教育部,谓“统计是项书籍,凡二百五十六夹,六千一百四十四函。又目录二十函,架图四册,另为一夹。内除第三百二十六、三百二十七两函原庋藏《日讲诗经解义》,今系空函,业经双方查明签字外,均已一律点收完竣,陆续装运到馆”。但在移交过程中,古物陈列所人员却将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一匣四函秘而不交。书架亦未能行移。京师图书馆只得于1916年9月9日再次呈文教育部,请求就上述两项事宜与内务部再行交涉。教育部致函内务部交涉之后仍未奏效,只

①以上引文,均据《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(1909-2008)》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09年,第147-148页。

②《鲁迅全集·日记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3年,第96页。

③以上引文,均据《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(1909-2008)》,第148页。

④《鲁迅全集·日记》,第178页。

好报告当时的国务院。9月22日,国务院以847号公函形式答复教育部,谓“热河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前经运京,由贵部庋藏在案。所有该书架阁一分,现储古物陈列所,应一并拨交贵部,以资保存。除分函外,相应函达查照接洽办理可也”。25日,教育部通知内务部,将于28日派部员戴克让及京师图书馆馆员曾劬洽办此事。9月30日,京师图书馆呈文教育部,报告奉命“派馆员乔曾劬、纪清樾会同部员戴克让如期前往古物陈列所,与该所人员王庆恒接洽。业于九月三十日开始搬运,先后共接收书架一百零三架,计一百零七件。惟此项书架历年稍久,朽损颇多,兹正雇工修理,一俟工竣,即可陈列”^①。至此,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始入藏于京师图书馆,上距1909年议决,已过七年。这个过程中,包含着不少鲁迅先生亲自斡旋的心血,也留下一段曲折苍凉的故事,更为文津阁原藏《古今图书集成》^②的去向,埋下觅踪的伏笔。

二、四库七阁的营建与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配置

乾隆三十七年(1772)正月初四,帝谕:“朕稽古右文,聿资治理……因思策府缥緲,载籍极博。其钜者,羽翼经训,垂范方来,固足备千秋法鉴。即在识小之徒,专门撰述,细及名物象数,兼综条贯,各自成家,亦莫不有所发明,可为游艺养心之一助。”然这些书“或逸在名山,未登柱史,正宜及时采集,汇送京师,以彰稽古右文之盛”。遂下令广征天下遗书,“副在石渠,用储乙览”^③。同年腊月,开始纂修。翌年夏,正式开设四库全书馆,以翰林院为办理处,武英殿为缮写处。馆开之后,即将翰林院藏书之所分为三处:凡内府秘书发到翰林院者为一处,翰林院由旧藏《永乐大典》内辑佚摘抄成卷、汇编成部者为一处,各省采进民间藏书者为一处。诸臣入院,各以所校阅某书、应考某典详列书目,至琉璃厂书肆访之。同时,任命皇室诸王及大学士十六人为总裁,六部尚书及侍郎为副总裁;总纂官、总校官、提调三百余人。纪昀、陆锡熊、戴震、邵晋涵、周永年、朱筠、姚鼐、翁方纲、王念孙等一批饱学之士,均在其列,成为都中盛事。

早在《四库全书》始修不久,乾隆帝就十分关心书成庋藏之事。他在《文渊阁记》中说:“凡事预则立。书之成虽尚需时日,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。

①以上引文,均据《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(1909-2008)》,第149-151页。

②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万卷,为古今类书之集大成者。康熙年间至雍正初,先后由陈梦雷、蒋廷锡二人受命编纂,雍正三年(1725)成书,四年雍正帝御制序文,并于六年以铜活字排印成书。

③《谕内阁着直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》,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第一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7年,第1、2页。

宫禁之中,不得其地,爰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待之。”^①并于乾隆四十七年(1782)以国书正书撰写《阁记》。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八日又谕:“朕稽古右文,究心典籍,近年命儒臣编辑《四库全书》,特建文渊、文溯、文源、文津四阁,以资藏庋。现在缮写头分告竣,其二、三、四分,限于六年内按期藏事。”^②这就是平常所说的内廷四阁,也称为北四阁。其实北四阁最先建成的是文津阁,乾隆三十九年(1774),帝以国书正书撰写了《御制文津阁记》。原因盖是热河承德避暑山庄,经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百年经营,不仅景色怡人,亦成为清廷的又一政治中心。乾隆每驻跸山庄,几乎都有御题诗赞。翁方纲《送丹叔侍郎赴热河弃度文津阁四库全书次石公秘检韵》诗云:“宸章岁岁励儒绅,拈出知津处处新。万派渊涵归典册,千峰环合拱星辰。函开滦水澄冰镜,诗对梅花屑玉尘。正是钱筵当雪后,十年惭说个中人。”说的都是实情实况。同年,即乾隆三十九年,圆明园内的文源阁落成。文溯阁在沈阳故宫,与文渊阁同完成在乾隆四十七年,帝亦以国书正书撰写了《御制文溯阁记》。

乾隆四十七年,当头部《四库全书》缮写藏事之际,乾隆又“思江浙为人文渊藪,朕翠华临莅,士子涵濡教泽,乐育渐摩,已非一日。其间力学好古之士、愿读中秘书者,自不乏人。兹《四库全书》允宜广布流传,以光文治。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、杭州圣因寺行宫之文澜阁,皆有藏书之所。着交四库馆再缮写《全书》三分,安置各该处,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,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、教思无穷之盛轨”^③。这份谕旨中既已提到扬州文汇阁、镇江文宗阁、杭州文澜阁,表明南三阁之建一定在乾隆四十七年之前。事实上早在乾隆四十二年,两淮盐政寅著领到朝廷颁贮扬州天宁寺和镇江金山寺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之后,就曾奏请依宁波范氏天一阁之式,新建藏书楼。所以乾隆皇帝说扬州、镇江、杭州皆有藏书之所。后又指出:“大观堂、金山寺二处,藏贮《图书集成》处,所空餘格甚多,即可收贮《四库全书》。若书格不敷,着伊龄阿酌量再行添补。至杭州圣因寺后之玉兰堂,着交陈辉祖、盛住改建文澜阁,并安设书格备用。”^④足见扬州文汇阁、镇江文宗阁确在乾隆四十七年以前即已建成。确切地说,镇江金山寺《四库全书》之文宗阁,落成于乾隆四十四年(1779),帝赐名“文宗阁”。翌年,扬州《四库全书》之文汇阁落成,帝赐名“文汇阁”。杭州则改建玉兰堂,乾隆四十八年底才藏工,帝赐名“文澜阁”。这样,我们就可以依时间早晚,将四库七阁落成顺序排列出来:乾隆三十九年,文津阁

①庆桂:《国朝宫史续编》卷五三《文渊阁记》。

②③《谕内閣着交四庫館再繕寫全書三分安置揚州文匯閣等處》,《纂修四庫全書檔案》第二冊,第1589頁。

④《寄諭閩浙總督陳輝祖等着江浙商人捐建文瀾閣并添置三閣書格》,《纂修四庫全書檔案》第二冊,第1590頁。

成;同年,文源阁成;乾隆四十四年,文宗阁成;乾隆四十五年,文汇阁成;乾隆四十七年,文渊阁成;同年,文溯阁成;乾隆四十八年,文澜阁成。

上述可知,从乾隆三十九年起北四阁次第建成,但全书却未修成缮竣,阁中一时无书可贮,帝遂令仿四库书函之式,装潢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皮架排列。又内务府奏销档载乾隆四十年五月十五日,金简奏为热河文津阁陈设《古今图书集成》装潢事曰:“查武英殿现存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书五部,内竹纸书四部、连四纸书一部。此一部系鄂尔泰家交回之书,残缺八十馀本,虽经奏明补写齐全,但书内原有虫蛀之处,难以陈设。现今装潢三阁陈设,应请统用竹纸书三部。”三阁指的是文津、文源、文溯三阁。因此可以肯定,除文渊阁外,其余北三阁陈设配置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皆为竹纸印造(也就是人们俗说的黄纸印本)。南三阁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起初并不是为《四库全书》配置,而是朝廷先赐给扬州天宁寺、镇江金山寺、杭州圣因寺行宫的赠品,待文汇阁、文宗阁、文澜阁建成皮置《四库全书》后,则仿北四阁模式,亦成为南三阁的陈设配置之书。这些事实证明,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,确曾陈设配置用黄纸印造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。可是前边说到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突然被运至北京时,先由内务部劫到紫禁城文华殿,后经教育部数度交涉,始依旧案入藏京师图书馆。纷纭复杂的交割中,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及当年文津阁所陈设配置的那套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。是根本就没运来,还是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变故?半个多世纪以来,不仅始终萦绕于怀,也诱发追踪其下落的历程。

三、文津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追踪

我供职国家图书馆,尚在“文革”之前。那时善本特藏部善本组办公在《四库全书》库。书架仍然整齐地陈列着,书函却已战备装箱皮藏别处。终日出来进去,看到的虽总是四库空架,但总能勾起一些联想。诸如此套《四库全书》是什么时候从避暑山庄运来北京的,用什么交通工具运来的,原文津阁配置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运出与否等等,常在脑际中形成一连串的问号。那时善本组组长是陈恩惠先生,先生保管四库乃至善本书库四十多年,堪称是国图善本书的守护神,是活字典。陈先生工作严谨,以馆为家,为人友善,奖掖后学。他的书法兼具欧、褚笔法,又得清初馆阁体神韵,清逸俊秀,在国图历史上堪称第一人。他是我一生最敬佩的正人君子,我的很多入门知识和国图故事,不少从他那里请益而来。他跟我讲过,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连书带架,都是用骆驼驮来的。迄今,网上仍有此种说法。这个说法极富传奇色彩。北京至承德的铁路,始修于1955年,1960年全线通车。1938年还修过古北口至承德的铁路,但后来被拆除。1914年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从承德运至北京时,两地尚无铁路,火车运送无从谈起。陈恩惠先生的说法,尚不能轻否。至若原

配置在文津阁中的那套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我问过陈先生，但他从未正面回应过。这是我追踪文津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去向的重要历程。

我来国图善本组工作时，国图有一部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亦为黄纸印造，书上没有文津阁的铃章，表明它不是文津阁的旧物。其后，遂利用图书馆搞古籍的人脉和机会，打听几家大型图书馆，仍无任何踪迹可寻。2007年春节甫过，2月28日至3月1日，文化部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“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”。邀集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主管的文化厅（局）长及图书馆馆长，讨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》。《意见》对古籍保护的重要性、紧迫性作了全面的阐述；明确了加强古籍保护的指导思想、基本方针和总体目标；对全面开展古籍普查、建立珍贵古籍评审登记制度、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等做了明确安排；对开展古籍普查人员、版本鉴定人员、古籍等级评定人员、古籍修复人员培训等提出了明确要求。同年秋天，各藏书单位开始申报自己的珍贵典籍，冬天即组织专家评审，计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、山东省图书馆、浙江省图书馆、徐州市图书馆、天一阁博物馆、陕西省图书馆、中医科学院图书馆、故宫博物院图书馆、南京博物院图书馆，报来九部雍正铜活字印本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均被列入第一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。第一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凡入选古籍2392部，量大书多，人们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宋元精品上，于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则很少倾心，尤其未注意各馆的申报说明及书上的铃章，使本该早十年就解开的疑团，又延宕了十年。

2014年秋，河北省古籍保护中心要评本省的珍贵古籍，邀我前去参评。为此，河北大学崔广社先生特来北京西站接我，遂一路前往。途中，崔先生谈到不久前曾去承德，在承德市图书馆发现了一部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尚存三千多册。我立即产生它是否即是原文津阁配藏的那一套的想法，遂决定择时前去调研。

2015年8月26至29日，与故宫博物院翁连溪、古籍保护中心郭晶组成三人小组，赴承德开始了三天的调研。在承德市图书馆古籍书库发现了不少殿版书，其中就有雍正铜活字印本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且为连四纸印造。现存四百二十四函，三千三百一十册。经与兰州所存原文溯阁那套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比对，不同之处有四：承德市馆所藏残卷封面本色已褪，看不出其当初是否为皇家御用的黄绫封面，而文溯阁那套则是皇家御用的黄绫封面；承德市馆所藏封面题签是印制的纸签再贴上去，文溯阁那套则是书签直接印在封面上；承德市馆所藏为线装，而文溯阁那套则是包背装；承德市馆所藏未见“文津阁宝”铃印，而文溯阁那套则铃盖“文溯阁宝”大印。这些差异，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，承德市图书馆所藏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不是原文津阁配置的那一套。燃起的追踪热望再度破灭。

2018年秋末冬初，南京博物院欧阳宗俊先生来京过访，闲谈中提起文津

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事，先生说此书就在南博。我忙问有无文津阁钤印，他毫不犹豫地说是。又问书怎么到了南博，先生则云那是民国年间划给“中央图书馆”的，后来未能携往台湾，故留在了南博。2019年春节前，欧阳宗俊先生尝电告节后准备来京会晤，很高兴。没过两天，我又致电欧阳先生，希望他能拍几张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图版，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大约十来天后，我便接获了图版：“文津阁宝”的钤印赫然在目（见图1、图2）。半个世纪的追踪，终于有了结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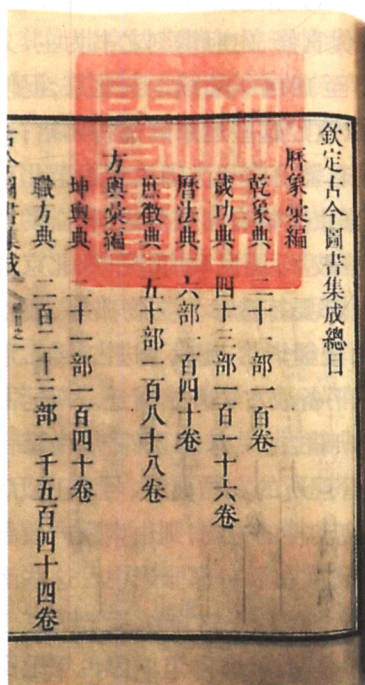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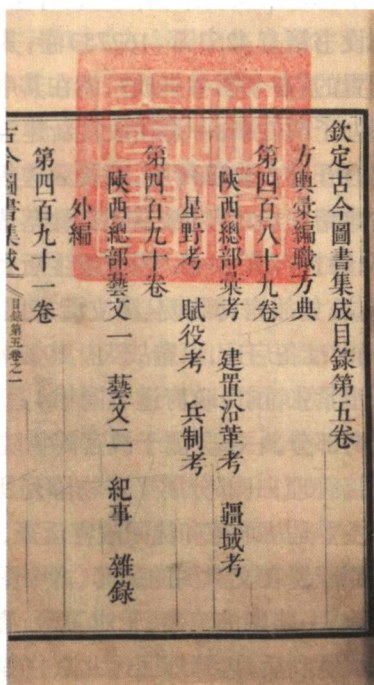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

四、承德避暑山庄古物典籍南迁再南迁

辛亥鼎革，宣统逊位，却仍然生活在紫禁城后部，即北区，前边地域殿宇，则由北洋政府接管，具体实施管理的则是北洋政府的内务部。民国之初，关注到热河避暑山庄及外八庙殿宇坍塌文物流散的热河都统，当是熊希龄。1912年4月，熊氏任唐绍仪内阁的财政部长，7月辞职，旋任热河都统。1913年，熊氏尝呈文袁世凯，谓光绪以来，曾将避暑山庄所藏瓷、玉、雕漆及紫檀器具等18万件文物分批运往北京，此地所剩虽非以前那么贵重，但数量仍然可观。这些文玩器物原设置的方位，不敢稍有移易。一旦移易，各殿宇之物，混淆在一起，将难以点清。所以即或房舍坍塌，也不敢轻易挪动。有鉴于此，遂

提出清点整理这些文物典籍,运至北京,妥求保管。熊氏此议,获内务部同意,于是开始整理分类,所得文物典籍凡十一万七千余件,分七批南运北京。与此同时,沈阳故宫十一万余件文物,也相继运来北京。熊氏在清点整理承德文物运京的同时,又对避暑山庄部分损坏建筑进行维修,但资金捉襟见肘,又想卖掉一些文物,取得一些资金,以资修缮。然此举一开,上行下效,遂导出一桩“热河行宫盗宝案”。彼时一些军阀头子,也借机巧取豪夺。像姜桂题之流,就乘机向熊希龄索取文物。

承德运京文物中,有书画、青铜、器物,也有典籍。据不完全统计,山庄各殿陈设书籍有4253部,162753卷,其中以清代官修、内府镌刻之书为主,文津阁配置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就在其中。1913至1914年陆续运到北京,促使内务部办了两件事:一是在故宫新建宝韵楼,以收贮这些运京的文物典籍;一是在故宫开办古物陈列所,以展示这些由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运至北京的文物典籍。1915年,故宫宝韵楼落成,两地来京文物有了安身之所。

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后,为防战争破坏,国民政府曾下令北京各收藏单位,如故宫博物院、国立北平图书馆等,都要拣选珍贵文物典籍,战备装箱,随时准备启运,以避战火。1933年日军由觊觎华北,变成了进占热河,形势进一步紧张,国民政府遂于同年4月下令,北平备战古物开始南迁。南运古物分成两部分,一部分属于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典籍,据说有80万件,属南京行政院直接管理;一部分属于古物陈列所、坛庙管理所的文物典籍,号称18万件,其中主要是从承德和沈阳故宫运来、保存在宝韵楼的古物,则由南京内政部管理。原配置在文津阁的那套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就在后一部分当中。这些南迁的古物,一路颠沛流离,千难万险,直到上世纪40年代,才陆续运抵南京。本待抗战胜利后,再筹划回运北京,奈内战旋即爆发,硝烟再起。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之前,又从南京拣选3000多箱精品文物运往台湾。剩下的部分,多集中收贮在南京朝天宫,后不少古物典籍归藏于南京博物院。原文津阁配置的那套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亦成为南京博物院的插架之物。

五、铜活字印本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存况

上述可知,原紫禁城内之文渊阁、沈阳故宫之文溯阁、圆明园内之文源阁、热河避暑山庄内之文津阁,即俗说的北四阁,皆配置有铜活字印本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。文渊阁那一部,已随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运往台湾,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沈阳故宫文溯阁那一部,亦随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移贮甘肃省图书馆,有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封面及“文溯阁宝”钐印可证。文源阁那一部,当年英、法联军攻入北京,火烧圆明园,同《四库全书》一道化为灰烬。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那一部,姜桂题钻空子,只依旧案将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运往北京,而配

置在阁中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则撤出留下,之后又随避暑山庄文物典籍南运而进入故宫博物院宝韵楼。1933年4月之后,再次南运至南京,故今藏南京博物院。因知原配置在北四阁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除圆明园文源阁那一部遭回禄之灾外,其余三阁所配置者仍存藏于世。不过,文渊阁、文溯阁所配置者虽仍与《四库全书》共存,但都离开了承载他们的原制配套书架。文津阁那一部虽存,却孤雁南飞,落入石头城中。至若度入南三阁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文汇阁、文宗阁两套,则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乱中与阁藏《四库全书》同归于烬。杭州文澜阁那一部,今藏浙江省图书馆。

其实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收藏一部铜活字印本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它不属于《四库全书》的任何一阁,卷端钤有宽边“静寄山庄”方印,卷尾钤有宽边“重华宫宝”方印。“静寄山庄”又名“盘山行宫”。盘山位于“蓟州城北二十五里,为汉末田畴隐居之地。五峰三盘,林壑幽邃,单椒秀泽,雄甲畿东。自圣祖仁皇帝四度临幸,宸章题咏,照灿岩阿”^①。雍正年间,乾隆尚在潜邸,尝奉命敬谒景陵。“往来蓟野田盘,山色宜人,盖蓄于目且沃于心矣”^②。乾隆九年(1744),“高宗纯皇帝以兹山为谒陵经过之道,臣工扈从劳勩,创里行宫,以为憩息之所。楼素不雕,名曰静寄山庄”^③。遂发内帑,营建山庄于盘山之阳。“天辟名区,全揽胜概。岁春秋有事于祖陵,每驻蹕行宫,几馀静憩,智仁乐趣,畅洽宸襟,山水效灵,益增神秀”^④。高宗弘历十分喜欢此境,不仅有《记》,且有十六景诗歌咏之,还将雍正铜活字印本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度于此处,并钤盖“静寄山庄”宽边方印,以示归属。至于卷末所钤宽边“重华宫宝”,盖亦有因。弘历未即皇位时的潜邸,称乾西二所。即皇位之后,则改头所为漱芳斋,并建戏台,改二所为重华宫,并改三所为重华宫厨房,改四、五所为建福宫及花园。因知重华宫乃乾隆为皇储时的住所,并由此而登大位,故改名重华。静寄山庄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原先盖即重华宫的旧物,后移贮静寄山庄,遂在卷首钤盖“静寄山庄”。细观两颗大印,不仅大小不同,印色也不全同。

除此之外,国家图书馆、山东省图书馆、陕西省图书馆、中医科学研究院图书馆、天一阁博物馆、徐州市图书馆、承德市图书馆等也都收藏有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但不在此文论列之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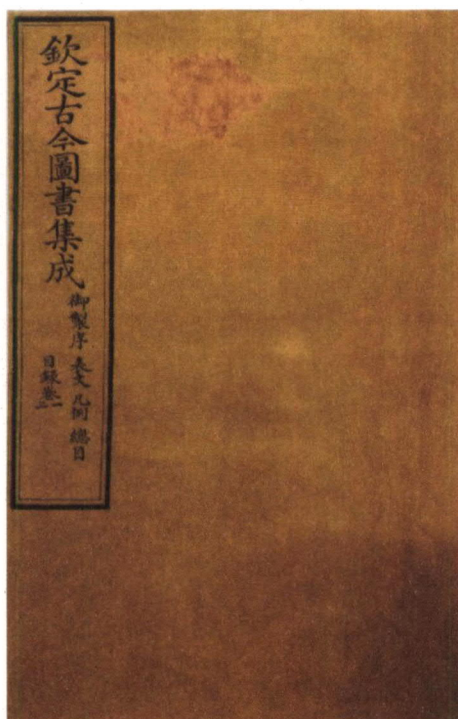
【作者简介】李致忠,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。研究方向:版本目录学、图书馆史。

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七十《钦定盘山志》,中华书局,1965年,第618页。

②《清文献通考》卷二二四《钦定盘山志》引《御制序》。

③穆彰阿等修:《〔嘉庆〕大清一统志》卷七。

④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七十《钦定盘山志》,第618页。



① | ②
③ | ④

①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书函

②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封面

③④《古今图书集成御制序》

详参李致忠《文津阁〈古今图书集成〉追踪记》

